

浙江出土青铜器研究

俞珊瑛

(浙江省博物馆 310007)

【摘要】 本文在对浙江出土先秦青铜器作分区研究的基础上,就不同地区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作了考察,发现在不同时期分别运用了浑铸法、分铸法两种成型技术为主的工艺。再结合这些器物的出土情况,明确其相对年代,并对不同期段青铜器的流动情况作了探索。

【关键词】 青铜器; 技术; 分期; 流动; 先秦; 浙江

一、分布

根据浙江的自然地理位置,可将出土的先秦青铜器划分为两个文化区域:太湖—杭州湾区和黄山—天台山以南区。

(一) 太湖—杭州湾区

本区西靠茅山东麓,北临太湖,南抵天目山至天台山一带,东至舟山。又可分6个小区。

1. 苕溪流域

太湖沿岸一带,东苕溪、西苕溪之间。包括长兴、湖州、安吉、德清、余杭等地。

长兴小浦出土青铜铙、簠^①;长兴中学出土青铜铙,和平公社出土青铜鼎^②;李家巷出土青铜壶^③;历年来在长兴港、洪山港、龙溪港等水利工程中出土青铜鼎以及大批青铜兵器、农具等^④。

湖州废旧仓库拣选铜钺^⑤,吴兴河道出土青铜戈^⑥;毗山遗址采集有青铜尊、铙、鼎残片及铍、削、镞等器^⑦。

安吉三官乡出土青铜鼎、觚等器^⑧;高禹镇出土青铜铙^⑨;高禹镇五福战国墓出土青铜剑、戈、盃等器^⑩;良朋上马山残墓出土青铜盃^⑪;安吉县城出土青铜矛、镞^⑫。

德清武康镇出土青铜句鑿^⑬;武康镇龙山村出土青铜鸕杖^⑭;吴县埭溪出土青铜杖镞^⑮。

余杭石漈出土青铜铙^⑯;仇山出土青铜凿^⑰、矛^⑱。

2. 杭州湾北侧

杭州湾以北沿岸一带。包括嘉兴、嘉善、海盐、海宁等地。

嘉兴净湘北荡、大桥乡高地、秀洲区皇坟山出土青铜铙、剑、矛^④。

嘉善丁栅张安村采集青铜犁沟器^⑤。

海盐通元石弄港出土青铜甗、锄^⑥；龙潭港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青铜镞、铙、刀等器^⑦。

海宁硖石长水塘采集青铜镰、矛等器，东山长水塘采集青铜戈^⑧。

3. 钱塘江下游流域

钱塘江下游两岸，包含了其支流浦阳江（西小江）流域。包括杭州、富阳、萧山、诸暨等地。

杭州湖墅出土青铜簋，西湖出土青铜锛、铲^⑨；历年来西湖出土青铜戈、矛等器^⑩。

富阳富春江北岸出土青铜器戈、矛、铙、铎^⑪。

萧山所前镇杜家村出土青铜甬钟^⑫；河庄镇、来苏乡出土青铜矛、斧等器^⑬。诸暨次坞镇上河村溪滩出土青铜炭炉，诸暨城东、山下湖镇、陈宅镇出土青铜矛、戈、铙^⑭。

4. 曹娥江流域

杭州湾南岸，曹娥江以东、以西地区。包括绍兴、上虞、嵊州等地。

绍兴西岸头遗址出土青铜构件^⑮；凤凰山木椁墓出土青铜剑、戈、环、镞等器^⑯；城关狗头山发现青铜句鑃^⑰；坡塘 306 墓出土青铜鼎、盃、甗、甗等器^⑱；漓渚出土青铜鸠杖^⑲；若耶溪出土青铜剑、削、斧等半成品^⑳；齐贤镇陶里壶瓶山遗址第二文化层出土青铜凿、铙^㉑；福泉镇出土青铜镇^㉒；印山越王陵出土青铜凿、锄、铎^㉓；塔山出土青铜甬钟^㉔；任家湾战国墓出土青铜车軛、马衔、兽形饰、镞、戈等器^㉕；西施山出土青铜鼎、盘、匜、勺等器，达 200 多件^㉖；历年各地陆续出土大批青铜农具^㉗、兵器^㉘等。

上虞银山冶炼遗址先后发现青铜锄、锛、铲、剑、矛等器^④；白马湖土墩墓 D1、D14 分别出土青铜剑、钺^④。

嵊州出土青铜镰^④。

5. 甬江流域

甬江沿岸地区，最东至舟山。包括宁波、慈溪、余姚等地。舟山为海岛，地近甬江，暂列入本小区。

宁波鄞县甲村出土青铜钺、剑、矛^④；钱岙遗址第一文化层出土青铜镞、削、铍^④；韩岭公社出土青铜甬钟，钱岙遗址春秋战国文化层出土青铜弩、削等器，境内各地陆续出土有大批兵器和农具^④。

慈溪彭东、东安土墩石室墓 M2、M7 分别出土青铜钺、削^④；横河出土青铜矛^④；彭东、石堰、陈山出土青铜剑、铲^④。

余姚老虎山一号墩 D1M10 出土青铜剑、戈^④。

舟山发现青铜锛、耨^④。

6. 东阳江流域

会稽山以南、东阳江沿岸地区。包括金华、义乌、东阳、磐安等地。

金华废旧仓库拣选青铜铙^④；金华城区出土青铜剑^④。

义乌西江桥、福田大王村、城中城大道出土青铜矛、钺，王宅公社拦水坝出土青铜剑^④。

东阳草干山土墩墓出土青铜环^④；李宅徐田村出土青铜鼎、车马饰等器，东阳江沿岸出水青铜句鑃、甬钟^④。

磐安深泽乡出土青铜铙^④。

（二）黄山—天台山以南区

本区西至新安江上游，北至天台山，南抵浙闽赣交界一带，东达海边。又可分 4 个小区。

1. 新安江流域

新安江水库北岸。已发表的材料有淳安左口土墩墓 M4 出土青铜矛^⑧。

2. 椒江流域

椒江、台州湾沿岸一带。包括仙居、临海、黄岩、温岭等地。

仙居湫山乡上田村发现窖藏青铜矛、犁、蚁鼻钱等器及饼形铜料^⑨。

临海上山乡发现窖藏青铜矛、镰、犁、蚁鼻钱等器及饼形铜料^⑩。

黄岩小人尖土墩墓出土青铜尊、杯、矛、短剑等器^⑪。

温岭琛山乡楼旗村出土青铜盘^⑫。

3. 瓯江流域

乐清湾、瓯江沿岸一带。包括乐清、永嘉、瓯海等地。玉环为海岛，地近乐清湾，暂列入本小区。

乐清白石杨柳滩出土青铜铍、钺、铜贝等器^⑬。

永嘉出土青铜鼎、盘等器与铜料^⑭。

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青铜鼎、簋、铙、矛、短剑等器^⑮；杨府山西南侧山腰发现青铜鼎^⑯。

玉环三合潭遗址出土青铜斧、钺、铍、鱼钩等器^⑰。

4. 飞云江流域

飞云江沿岸。

已发表的材料有瑞安岱石山“石棚”墓出土青铜铃、短剑等器^⑱。

5. 钱塘江上游流域

浙赣交界处的江山港沿岸。

已发表的材料有江山出土一组青铜甬钟^②。

二、技术

以上出土青铜器，除去明确的输入器和典型的楚器，如安吉出土有铭文的铜觚，绍兴出土有铭文的徐器、吴国器，安吉五福战国楚墓出土的铜盃等以外，其他青铜器就技术的层面来看，可分成以浑铸法成型技术为主和以分铸法成型技术为主两大类。

（一）以浑铸法成型技术为主

运用浑铸法成型技术为主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苕溪流域，椒江、甌江流域等地。代表性的有长兴、余杭、安吉、黄岩、甌海、瑞安、金华、磐安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群。

1. 苕溪流域

长兴铜簋由 4 块腹范、1 块圆形底范和 1 块芯范浑铸成型。其腹部花纹四分，作对称状（图一）。



图一，1 长兴铜簋腹部纹饰四分对称



图一、2 长兴铜簋底部

长兴、余杭铜饅由 2 块器范、1 块芯范浑铸成型。甬部、舞部范线明显。其中长兴小浦、余杭饅舞部范线的一边皆可见有明显的浇铸痕迹。

长兴港铜鼎铸型由 3 块腹范、1 块三角形底范和 1 块芯范组成。耳、足浑铸，其中腹范范缝与足对齐（图二）。



图二，1 长兴港铜鼎腹部范线与足对齐



图二，2 长兴港铜鼎三角形底范

安吉铜鼎，作鬲式，其耳、足浑铸。腹范三分，不设底范。三条范缝汇于器底，三扉棱位置与足对应，可知腹范范缝与足对齐（图三）。



图三 安吉铜鼎腹部扉棱与足对齐

2. 椒江、甌江流域

黄岩铜尊由 2 块器范、1 块芯范一体浑铸成型。器型、纹饰皆模仿西周中期器，其变形兽面纹、凤鸟纹做工粗糙。

黄岩铜戈由二分范法铸造成型后，在内与援之间镶嵌绿松石片，需再经过打磨、切割、镶嵌绿松石等技术过程。

瓯海绳纹立耳铜鼎由 3 块器范、1 块芯范组成，不设底范。器腹与耳、足等一体浑铸成型，三扉棱抵足（图四）。三条铸缝聚在铜鼎底部，且恰好顺三足中部穿过，强调范缝与足在位置上对齐（图五）。另外鼎的两耳与其中的两足呈平行关系，这显然是在模仿殷墟文化时期铜鼎的范型，而与二里冈文化时期鼎一耳与一足相对有所不同。而 2009 年新出土的另一件残鼎由 3 块腹范、1 块三角形底范及芯范浑铸成型。其足为大半环形的内空足，这在邻近的吴地及南方地区较为常见^⑨。



图四 瓯海铜鼎扉棱抵足



图五 瓯海铜鼎底部范线

瓯海簠、铙的铸造方法皆与苕溪流域的相同。瓯海短剑在剑茎上运用了铸接技术，倒凹字形方格穿于方茎之内，格在另行铸造后，再铸接到剑身（图六）。这为本时期出土青铜器所仅见。



图六 瓯海铜短剑方格穿过方茎

3. 东阳江流域

金华、磐安铜铙的铸造方法皆与苕溪流域的相同，其中金华铜铙甬部顶端残留有明显的浇铸痕迹（图七）。



图七, 1 金华铜铙舞部的合范范线



图七, 2 金华铜铙甬部的浇铸痕迹

（二）以分铸法成型技术为主

运用分铸法成型技术为主的青铜器，最集中分布在曹娥江、浦阳江流域。代表性的有绍兴坡塘、西施山及诸暨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群。此外在苕溪流域、杭州湾北岸、瓯江流域等也有出现，如长兴、安吉、海盐、东阳、永嘉、仙居、江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群。

1. 曹娥江流域

绍兴坡塘 306 墓铜鼎，缺盖，腹与耳、足分铸。腹范 3 块，底范作一大圆形。腹范范缝不与足对应，底范中心有一长条

形的浇铸痕迹。耳、足皆为预制后再嵌铸到鼎身（图八）。



图八，1 绍兴306墓铜鼎



图八，2 绍兴306墓铜鼎底部范线与浇铸痕迹

306 墓铜甗、甗盂，皆分体，其足浑铸。器范 3 块，底范作三角形，连三足。其中甗盂的流、柄，盖上的环钮皆为预制后嵌铸而成。底范中部有一长条形铸疣。

此外 306 墓铜甗、铜盂、伎乐铜屋、方形插座等，也运用了分铸、焊接技术。其中铜屋内的人俑和乐器焊接在长方形底板上的铸痕清晰可见（图九）。而插座的垫脚则运用了凸榫连接技术，其人俑背上可见有插孔。



图九，1 绍兴306墓伎乐铜屋人俑底部的焊接痕迹



图九，2 绍兴306墓伎乐铜屋底座焊接的铆钉

西施山铜鼎，运用了分铸、焊接技术。腹范 2 块，下接 1 块圆弧形底范，一条范缝与足的位置对齐（图十）。其中一件残鼎的耳、足与鼎身接合处可见有明显的焊痕（图十一）。另一件二立耳与鼎身浑铸，三足则另行分铸后，再焊接到鼎腹上。



图十 绍兴西施山铜鼎底范



图十一 绍兴西施山铜鼎耳、足与腹部间的焊接痕迹

西施山盘形器，如盘、匜、横器，器壁薄、无铸痕，系加热后打制，再经锤锻、结晶、退火而成。其耳、环钮、足等附件，则为分铸后焊接到器身，皆可见有铆钉（图十二）。此外还使用了线刻工艺，在内外壁、底部等满饰人物、建筑、鸟兽等图纹。

系由硬度较高的金属工具刻划而成，在器物成型后，经磨光、绘图、刻纹、外镀锡铅等多道工序^④。是春秋以来的新兴工艺之一，

程序复杂，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图十二 绍兴西施山铜匜铆钉焊接的环钮

2. 其他地区

诸暨炭炉，运用了分铸、焊接技术。腹范 3 块，下接 1 块圆形底范。环钮、把手、足为分铸后再焊接到器身，炭炉内壁、底皆可见有清晰的铆钉（图十三）。整器的纹饰运用了模印技术，也为本时期的新兴工艺之一。



图十三，1 诸暨炭炉内壁的铆钉



图十三，2 诸暨炭炉外底部

长兴李家巷铜鼎，分铸、焊接而成。腹范 3 块，底范圆形，一条范线与足对应。耳、足分铸后再铸接到鼎身。

海盐铜甗上部缺失，下部器范 3 块，底范三角形，无铸疣。三足实心，分铸后浇铸到器身（图十四）。



图十四，1 海盐铜甗补铸的三足



图十四，2 海盐铜甗底部

东阳铜鼎的铸造方法与 306 墓器相同。

永嘉铜鼎、盘的铸造方法与西施山器相同。

仙居一青铜残片的线刻工艺与西施山器相同。

以浑铸为主的成型技术，为中原地区商代、西周时期的流行方法。苕溪、椒江、甌江流域等地的浑铸技术，应是中原地区影响的结果。虽然如此，但当时的浙江并没有能够得到中原的完整技术，因此作了一些局部的变通与调整。并且同时也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如甌海铜鼎出现的半环形内空足，其在合范时足芯范与鼎底范相连，简化了技术难度，这种做法不仅在邻近的吴地多见，且在较远的曾国青铜器上也所在多有^⑧。其时间，则多集中在西周晚期左右。

而分铸技术，要到中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才出现，但也并不普遍，真正比较广泛的使用，则是春秋中期开始的。它影响到器物的形制，使其分化为器体和附件两大类。此外大量新式技术如焊接、锻造工艺等的运用，使得分工日趋细密、专门化，生产效率也不断提高。学者们多将此一分体铸造时期总结为“分铸阶段”^⑨。相信曹娥江、浦阳江流域等地分铸、焊接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应是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以浙江出土礼乐器中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铜鼎范型为例。浑铸时期三分器范，一种不设底范，一种设一块三角形底范。腹范范缝与三足对应。这个特点与中原地区殷墟时期至春秋早期青铜鼎的范型对应。而分铸时期则表现为腹范下接一大块圆弧形底范，一种腹范三分，一种二分。前者腹范范缝不与足对应，后者一条范缝与足对齐，但十分罕见，当为浙江独有。前者与中原地区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鼎的范型基本上是一致的^⑩。而后者的情况，也与当时各地区青铜器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吻合。

三、分期

根据上述的技术分析，浙江出土的青铜器，相应地可分为两个时期：（一）第一期，即浑铸时期，约在春秋中期之前，包括苕溪、椒江、甌江流域等地；（二）第二期，即分铸阶段，约在春秋中期之后，包括曹娥江、浦阳江流域等地。

（一）第一期

本期青铜器，苕溪流域绝大多数没有明确的伴生物及地层。只安吉三官乡有伴出器物玉柄形器、环、璜及绿松石片等，但墓葬形制不明。其玉器组合中，缺乏西周土墩墓中普遍出现的玦^⑪，而有春秋时期大量出现的璜与环^⑫。综合推断其年代当在春秋早期^⑬。

而椒江、甌江、飞云江流域皆出自土墩墓或石棚墓中：

黄岩土墩墓一墩一墓，有类似石框的石结构墓底。同出原始瓷豆、罐、簋，夹砂陶鼎，玉玦、凸棱环。甌海土墩墓一墩一墓，平地掩埋。同出玉镯、玦、柄形器，绿松石串饰等大批玉石器，但不见陶瓷器。瑞安石棚墓，不见石结构墓底，但有墓坑迹象。其中 M5 同出原始瓷豆，素陶豆，印纹陶罐，夹砂陶罐；M29 同出原始瓷豆，素面陶盂；M30 同出原始瓷碗、盂、罐、豆，素面陶罐、鼎、簋，泥质陶罐，陶纺轮。

上述墓葬，葬制特点为一墩一墓，开始出现石床。陶瓷器中原始瓷接近半数，其次为印纹硬陶，夹砂陶最少。流行原始瓷鼓腹罐，矮圈足的豆、碗，以及印纹陶无颈罐等。纹饰常见细弦纹、“S”形附加堆纹，及拍印的曲折纹等。参照以往学者对土墩遗存的分区、分期研究，椒江、甌江、飞云江流域属于黄山—天台山以南文化区，而上述特点，出现于五期三段，时间上大致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④。

另外一些铸造技术较简单的青铜器，如淳安铜矛、东阳铜环，也皆出自一墩一墓、墓底铺垫鹅卵石的土墩墓中。且同出的原始瓷碗、碟、盂、鼎等，无论器型、纹饰皆与椒江、甌江、飞云江流域本期段的器物接近。那么这几件青铜器的年代也应相当。综上，第一期青铜器的年代可确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具体包括黄岩、甌海、淳安、东阳土墩墓及瑞安石棚墓、安吉三官乡出土的青铜器群；长兴铜鼎、铙、簠，余杭、金华、磐安铜铙，温岭铜盘^⑤等。长兴港铜鼎的年代尚有争议，现存疑，暂归入本期。

（二）第二期

本期青铜器数量众多，分布也较广。除去大量零散出土的农具、兵器，前述分铸成型技术为主的青铜器，根据出土情况，又可分成两段。

1. 第一段：以绍兴坡塘等器为代表。

306号土坑墓，墓道带壁龛，伴出泥质陶罐、豆，漆盒、玉瑗、玛瑙管饰、金舟等。土坑墓为江南地区春秋时期开始兴起的新形制，此前盛行土墩墓或土墩石室墓。大量漆器遗迹的出现，是春秋以来楚文化不断东进、影响的结果^⑥。该墓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另外一些铸造技术较简单的青铜器，如绍兴印山，该墓“甲”字形深竖穴土坑，伴出玉镇、玉钺、石矛、漆木器、泥质陶等。为越王句践之父允常墓，年代为春秋晚期。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第二文化层伴出原始瓷碗，泥质陶罐、盘、钵等，年代在春秋中期前后。“其次”句鑊为春秋晚期器^⑦。绍兴等地鸕杖的跽坐人俑与306墓铜屋接近，则年代相当。

上虞白马湖石室土墩墓D1伴出原始瓷盅式碗、D14伴出陶纺轮，年代在春秋晚期前后。上虞银山遗址伴出印纹硬陶罐、瓮及铅块，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慈溪土墩石室墓M2伴出原始瓷盅式碗，滑石璧、瑗，M7伴出泥质陶璧、盆等，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宁波钱岙遗址第一文化层伴出原始瓷碗、印纹硬陶瓮、泥质陶豆等，年代在春秋晚期前后。

则本期第一段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2. 第二段：以绍兴西施山等器为代表。

西施山遗址同出铁鼎、矛、权，原始瓷镇、弧腹碗，印纹硬陶罐、坛，泥质陶罐、豆、杯，木祖等。海盐同出有陶纺轮、石铍。永嘉同出少量锡块、铁铎。

以上，铁器尤其是农工具的大量出现，代表了战国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⑧。原始瓷器具有战国中期前后的特征。泥质陶

器具有战国中晚期风格^⑨。其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前后。另外一些铸造技术较简单的青铜器，如绍兴凤凰山，该墓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伴出泥质陶鼎、印纹硬陶罐、漆豆、原始瓷熏、“不光”石矛等器，年代在战国中期前后。

任家湾，长方形土坑木椁墓，伴出泥质陶编钟、编磬，漆乐器底座，硬纹硬陶罐等，年代与凤凰山相同，战国中期之际。

余姚老虎山 D1M10，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伴出原始瓷壶、印纹陶罐、玉璧、漆木器等，年代在战国晚期，下限可至西汉初。

安吉五福，“甲”字形土坑木椁墓，伴出泥质陶鼎、漆盒、木俑等，典型楚墓，战国晚期。良朋上马山残墓，伴出原始瓷壶的形制与余姚老虎山一致，年代为战国晚期。

仙居、临海、乐清青铜器内涵与西施山相同。玉环三合潭遗址伴出石斧、印纹硬陶鼎、原始瓷豆等，器物的年代不一，但青铜器内涵与西施山相近。

则本期第二段的年代集中在战国中晚期。

综上，第二期青铜器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又可分成前、后二段：

第二期第一段，即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集中在曹娥江、浦阳江流域，此外苕溪流域等地也有分布。具体包括绍兴坡塘、印山、陶里壶瓶山遗址，东阳李宅，上虞白马湖、银山，慈溪，宁波钱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群；长兴李家巷铜鼎，诸暨炭炉，萧山、宁波甬钟，“其次”句镬，漓渚、德清权杖等。

第二期第二段，即战国中晚期前后。集中在曹娥江流域，以及椒江、甌江流域等地。具体包括绍兴西施山、凤凰山、任家湾，余姚老虎山，安吉五福、良朋，仙居，临海，乐清，玉环，永嘉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群；海盐铜甗、富阳铜铎、江山甬钟等。

四、流动

浙江出土的第一期青铜器，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器，其范围与土墩墓、原始瓷的分布区域重叠，两者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土墩墓在浙闽赣交界一带出现后，开始由南往北扩散。新安江流域，飞云江、甌江、椒江流域是越之土墩墓北进过程中的分支，以后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与到达杭州湾两岸之越人的联系并不显著。越文化类型在商代中晚期也已北渐至太湖—杭州湾区，相应的苕溪、东阳江流域出现土墩墓遗存。而吴人的势力要很晚才到达茅山以东的太湖区域^⑩。因此，新安江流域，飞云江、甌江、椒江流域和苕溪、东阳江流域都属越人的活动区域，大体上属于越建国前的文化遗存。相信这些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正是随着土墩墓的扩散而流动的。

第二期青铜器，其中的第一段即春秋晚期至战国之际的大批青铜器，包括中原风格的礼乐器和徐国青铜器出现在杭州湾两岸，并特别集中在曹娥江、浦阳江流域。这和越国统治者的族源背景以及勾践争霸中原的历史密不可分^⑪。越文化类型的一部分在春秋中期跨过钱塘江向南迁徙、传播，并随着越人势力的强盛而达到高峰^⑫。越国在春秋中期开始强大，并在会稽山北麓的浦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杭州湾两岸正是越国的中心区域，而出土青铜器最多的绍兴正是越国的核心——都城所在地。

而第二期第二段即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则最集中在曹娥江流域、椒江及甌江流域等地。越国在灭吴以后，一度北上中原。之后受到各种势力的压迫，迁回南方，并于公元前 333 年被楚所大败^①。其后安吉等地为楚文化势力所浸润。然而楚最终未能完全消灭越国，越国势力退守会稽山一带，依然强盛^②。因此，本期段的青铜器多楚式，而绍兴地区也仍然有大量越国的青铜器。越人于此之后，加快往南海沿岸迁徙的步伐，分别在灵江（即椒江）、甌江、闽江一带建立了东越、甌越、闽越等国，最远的到达两广建立了南越、西甌等^③。地处椒江、甌江流域之间的仙居、临海、乐清、玉环、永嘉出土了大批与西施山内涵接近的青铜器，在地点和时间上皆与越人南迁的这段史实基本吻合。

历史上，在西汉初期，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曾有东甌国的存在。东甌国系从闽越国分封而来，领有今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区，前后只存在了 54 年时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确认温岭塘山大墓、大溪古城即是东甌国的遗存^④。其出土器物表明仍然是越文化的传统，但主要是原始瓷、硬陶、泥质陶、玉器，而青铜器基本绝迹。

综上，浙江出土的青铜器，最迟至西周晚期已出现于黄山一天台山以南区的土墩墓中，其后随着土墩墓的扩散，差不多同时到达太湖—杭州湾区，并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峰。春秋中晚期随着越人势力的强盛跨过钱塘江，到达浦阳江、曹娥江流域之间，与此同时青铜器也出现了第二个繁荣发展期。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日益受到楚文化势力的渗透、压迫，越人的一些支族沿南海岸大规模迁徙，到达椒江、乐清湾、甌江一带。到西汉初期绝迹，青铜器时代至此结束。

注释：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长兴县出土的两件铜器》，《文物》1960 年第 7 期。

② 长兴县文化馆：《浙江长兴县的两件青铜器》，《文物》1973 年第 1 期。

③ 夏星南：《浙江长兴发现东周铜器》，《文物》1981 年第 12 期。原报告中青铜壶的图片模糊不清，后据笔者对照器物，认为不是东周器，而应是宋代的文物。

④ 夏星南：《浙江长兴出土五件商周铜器》，《文物》1979 年第 11 期。夏星南：《浙江长兴发现东周遗物》，《考古学集刊》第 5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剑》，《考古》1989 年第 1 期。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出土吴越青铜农具》，《古今农业》1987 年第 1 期。

⑤ 《全国拣选文物展览》（1983 年）浙江省展品 19 号。湖州市废旧物资公司金属仓库拣选。

⑥ 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慈溪遗珍》编辑委员会：《慈溪遗珍——慈溪市博物馆典藏选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第 110—111 页。

⑦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毗山》，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425—426 页。

⑧ 浙江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物》1986 年第 2 期。

⑨ 周意群：《安吉发现一件西周时期铜铙》，《文物》2005 年第 1 期。

-
- ⑩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五福楚墓》，《文物》2007 年第 7 期。
- ⑪ 安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安吉出土春秋青铜盃》，《文物》2006 年第 11 期。
- ⑫ 程亦胜：《浙江安吉发现一件铜矛》，《文物》1999 年第 4 期。
- ⑬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15 页。
- ⑭ 周建忠：《德清出土春秋青铜权杖考识》，《东方博物》第 13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⑮⑯ 《文博简讯》“浙江省”条，《文物》1972 年第 3 期。
- ⑰ 王士伦：《记浙江发现的铜铙、釉陶钟和越王石矛》，《考古》1965 年第 5 期。
- ⑱ 浙江省博物馆编：《越地范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64 页。
- ⑲⑳ 蒋琳：《浙江省博物馆藏出土先秦青铜兵器》，《东方博物》第 25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㉑ 嘉兴市文化局编：《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集 · 器物卷》，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年，第 98—101 页。
- ㉒ 同⑲，第 97 页。
- ㉓ 海盐县文化馆：《浙江省海盐县出土商周青铜》，《考古》1981 年第 1 期。
- 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龙潭港遗址汉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 14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㉕ 海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海宁典藏》上《文物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年，第 93—103 页。
- ㉖ 同⑰，第 49、64、66、68—69、74—75 页。
- ㉗ 周仁花：《富阳文物馆藏的几件先秦青铜器》，《东方博物》第 31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㉘ 张翔：《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西周甬钟》，《文物》1985 年第 4 期。
- ㉙ 萧山博物馆藏。
- ㉚ 暨博物馆藏。
- ㉛ 彭云：《绍兴西岸头遗址出土一件春秋铜构件》，《文物》1993 年第 8 期。
- ㉜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凤凰山木椁墓》，《考古》1976 年第 6 期。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文物》2002 年第 2 期。

-
- ⑬ 绍兴市文管会：《绍兴发现两件》，《考古》1983年第4期。沙孟海：《配儿考释》，《考古》1983年第4期。
- ⑭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市文管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⑮ 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七千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浙江省博物馆编：《越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56—57页。
- ⑯ 周燕儿：《试述绍兴新出土的越国青铜器》，《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
- 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126—154页。
- ⑱ 周燕儿：《对绍兴出土战国权形器的思考》，《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 ⑲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 ⑳ 曹锦炎：《自铎铭文考释》，《文物》2004年第2期。蒋明明：《浙江绍兴市发现一件春秋铭文铜甬钟》，《考古》2006年第7期。
- ㉑ 蒋明明：《浙江绍兴皋埠任家湾茅家山战国墓清理简报》，《东方博物》第1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
- ㉒ 刘侃：《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文物研究》，《东方博物》第3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 ㉓ 董忠耿：《试论绍兴出土的越国青铜农具》，《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
- ㉔ 彭云：《绍兴出土越国青铜剑及其演变》，《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
- ㉕ 章金焕：《浙江上虞市银山冶炼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3期。
- ㉖ 王晓红：《上虞白马湖石室土墩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29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 ㉗㉘ 曹锦炎、周生望：《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考古》1984年第8期。
- ㉙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钱岙商周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
- ㉚ 宁波博物馆藏。
- ㉛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彭东、东安的土墩墓与土墩石室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5—199页。
- ㉜ 《慈溪遗珍》编辑委员会：《慈溪遗珍——慈溪市博物馆典藏选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12—113页。

-
- ⑤ 陈元甫：《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 年，第 51—95 页。
- ⑥ 王和平：《舟山发现东周青铜农具》，《文物》1983 年第 6 期。
- ⑦ 《全国拣选文物展览》（1983 年），浙江省展品 52 号，金华地区土产公司废旧物资仓库拣选。
- ⑧ 金华博物馆藏。
- ⑨ 义乌博物馆藏。
- ⑩ 东阳市博物馆藏。发掘领队沈岳明，资料整理中。
- ⑪ 《东阳宝荟——东阳市博物馆藏品集》编辑委员会：《东阳宝荟——东阳市博物馆藏品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年，第 130、131 页。
- ⑫ 赵一新：《浙江磐安深泽出土一件云纹铙》，《考古》1987 年第 8 期。
- ⑬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浙江淳安左口土墩墓》，《文物》1987 年第 5 期。
- ⑭ 张珣：《仙居湫山乡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东方博物》第 36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 ⑮ 王海明：《浙江南部先秦文化遗存浅析》，《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 年。
- ⑯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 年。
- ⑰ 台州地区文管会、温岭县文化局：《浙江温岭出土西周铜盘》，《考古》1991 年第 3 期。
- ⑱ 温州市博物馆藏。
- ⑲ 徐定水：《浙江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简介》，《文物》1980 年第 8 期。
- 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瓯海区文博会：《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11 期。
- ㉑ 温州市瓯海区文博会：《温州瓯海杨府山出土三件西周青铜鼎》，《东方博物》第 36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 ㉒ 台州市文管会、玉环县文管会：《浙江玉环岛发现的古文化遗存》，《考古》1996 年第 5 期。
- ㉓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 年。
- ㉔ 柴福有：《浙江江山出土青铜编钟》，《文物》1996 年第 6 期，第 85—86、73 页。

-
- ⑦ 李朝远：《吴地青铜器未受商文化影响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 8 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年。
- ⑧ 何堂乾：《刻纹铜器科学分析》，《考古》1993 年第 5 期。
- 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52—259、333 页。
- ⑩ 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 年，第 124—127 页。
- ⑪ 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 274—278 页。
- ⑫ 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考古》1984 年第 7 期。
- ⑬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阳市博物馆：《浙江东阳前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8 年第 7 期。
- ⑭ 马今洪：《试论浙江安吉三官乡土墩墓出土青铜器》，《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7 年。
- ⑮ 杨楠：《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遗存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报》1999 年第 1 期。
- ⑯ [日]林巳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7 年。
- ⑰ 刘和惠：《楚文化的东进》，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83—90 页。
- ⑱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八册，科学出版社，1957 年。
- ⑲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 年。
- ⑳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漓渚的汉墓》，《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
- ㉑ 杨楠：《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遗存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报》1999 年第 1 期。王屹峰：《浙江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群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58—160、169 页。
- ㉒ 王屹峰：《绍兴 306 号墓出土的伎乐铜屋再探》，《东方博物》第 32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㉓ 王屹峰：《浙江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群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
- ㉔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 ㉕ 《水经·河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前 312）……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
- ㉖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36 页。

⑬ 陈元甫：《浙江温岭汉代东瓯国城址与贵族大墓》，《东方博物》第 25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